

黄永年◎著

黄永年



谈艺录



中华书局

黄永年◎著

黄永年



谈艺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永年谈艺录/黄永年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4
ISBN 978-7-101-09607-1

I. 黄… II. 黄… III. ①汉字-书法-文集②篆刻-文集
IV. ①J292.1-53②J292.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7500 号

书 名 黄永年谈艺录
著 者 黄永年
责任编辑 李洪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20×980 毫米 1/16
印张 10½ 插页 2 字数 8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607-1
定 价 22.00 元



可以永恒的传承

——写在《黄永年谈艺录》出版时

岁月在冲刷着一切有形的痕迹，同时也在消融着自以为可以深藏心底的记忆。不知不觉而渐行渐远，也许可以永恒的只是一脉传承，或者一片希冀。“一年容易又秋风”，蓦然回首的时候，竟又是一望萧疏的天地。忽然想起允诺过的事情已经迁延良久，那就是要为已故恩师的著作出版写一点文字，于是，再捧鸿文而重温胜义。我的恩师，就是黄永年先生，而由先生的哲嗣寿成兄编辑的先生的书，就是《黄永年谈艺录》。

《黄永年谈艺录》所收篇什，或以为皆是先生主业以外的馀事所得，用先生的话说只是业馀的爱好。但这些教益却多是我随先生受业问道乃至安身立命所最偏好的学问和用功的方向，譬如碑刻与拓本，又譬如书法与篆刻。因此于我而言，自然最能感受到“鸿文沾溉远，胜义启迪深”。

先生乃是当世推许的通儒硕学，其在版本目录与唐代史学领域为公认的大家，而对古小说与古名物的研究也有着卓然建树。即便如此，先生犹能以旺盛的精力与聪慧的才识而广博其对艺文的热爱，于是，在碑刻学与书法史以及篆刻艺术诸学科，竟同样收获

了令人钦羡的成就。

生为吴人的先生，却顺于运命而执教于长安，并终老于斯，这或许正与他得以成就其精殚唐史之功冥中契合。想当年先生以所藏唐《张维岳碑》拓本延请长安著名鉴赏家陈泽秦跋尾，陈氏在跋语中云：“永年作客长安，金石自娱，于有唐一代碑版，尤为留意，广事搜访，藏弄甚富，且博学强记，卓具史识，有志著述。钩沉阐微，补新旧《唐书》之未逮；采佚缀遗，存阙补文献于已呈，其有意乎。”或许这真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吧。叶昌炽有“欲访唐碑当入秦”语，先生落脚关中搜讨唐代碑志拓本并藉以考史，岂非正好得此近水楼台之便。而先生的素来倾心于碑版鉴藏与考订，也与他早年受到叶昌炽《语石》和《缘督庐日记》的影响最多且最爱叶氏文辞优雅的“儒生面目”不无关系。

先生常常提到清代乾嘉以后的学者最崇尚“淹通”，并在讲授《碑刻学》时特别强调了彼时欲跻身一流学者行列所需具备的十大学术能力，即一要研究经学《十三经》，读注疏，做考证，写经解；二要读前四史，尤其《史记》与《汉书》；三要读几种子书；四要读有名的诗文集，并下一定的功夫；五要懂版本、目录，能写题跋；六要懂碑刻学，即广义的金石学，并能写题跋；七要（对清后期学者）最好懂西域地理；八要懂点佛教东西的，就更高明一筹；九要读《说文》，兼能一点训诂；十要会做骈体文。这其中正包括了通“碑刻学”，并应合了先生所说的“此时期之旧式文人若不知金石则不得齿于通人之列”，而惟先生既能淹通碑版，复能拓展其旁支以兼擅书法，且长于篆刻，则先生又自然要高出同侪一头。不过照此看来，通碑刻之学在当时学者眼中原本并不能

算作馀事。只是因为近世以来金石分家且偏重考古而冷落碑刻，遂使斯道中衰，于是先生特为振衰起绝而创开课程并撰写讲义，屈指三十年将去，却不曾想今日研习碑刻与鉴藏拓本之风大炽，先生的《碑刻学》理论遂成为最好的实用教材并深受热捧。

先生特精于鉴赏题跋，而尤能探索其中史事，故不惟局限于拓本与书法之优劣品评，遂自高过通常鉴赏家一筹。譬如先生在读大学时就写出了理据充分而辨析透辟的《叶昌炽所藏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辨伪》，好比“洗净匡庐真面”而足以见证先生承学乾嘉考据的功底之深厚。又尝撰《汉樊敏碑与唐樊兴碑——评任乃强〈樊敏碑考略〉》，缘先生对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详熟和对于汉隶与唐楷以及康有为所谓的“干禄”书体之明察，遂能证据确凿地纠正被康有为形诸“莲花出水，明月开天”而誉在“干禄上品”之“《樊府君碑》”乃是唐《樊兴碑》而非汉《樊敏碑》。先生治碑刻学之精到，于斯可见一斑。而可喟的是六十馀年过去，于今犹有如斯误读者在，即今年十月在雅安召开的“中国书法史论第九届国际研讨会”上，竟依然有包括《樊敏碑》所在地的芦山同仁等学者撰文仍引用康有为以此说以评誉《樊敏碑》而为我所察觉并即时纠其谬失。看来此说传讹甚远且常不为人所用心核实其正解，可叹人之惰性与取巧的劣根颇难剪除。先生又撰《记话雨楼旧藏马天祥造像记》，从形制、书体、内容及流通——点明此有金农题签的拓本所以见珍之理由，而更高明的是先生还从碑刻学史与书法史的层面做了拓本鉴伪的考证，有趣地指出凡“祥”字带有两条尾巴者即是伪刻，并就“大齐武平九年”的落款盖当缘出边鄙地区或不知中朝政局变化而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合理解析。

重温胜义，不能不为先生的通识学养和考据功夫再次抵掌唱绝，而先生此文亦足堪奉为学习碑拓鉴别方法论之典范。

先生复谙熟于书法，不惟以工稳匀整的小篆见长，更能写一手流美润泽的褚派楷书，又常于楷法中兼带行笔，自如秀丽而挺拔开张，是知以学问驭书法，则气象自然非凡。二十五年前随先生读书时尝见先生为他的老师蒋天枢所书墓碑手迹，正是这样一派充满褚书意味的面貌。正缘于先生对书法的敏锐眼光，故其所论书体流变，虽皆篇幅未长，却竟能出心得而树新义，且所论更都是最见实际又容易含混的问题。譬如字体是认知书法流变的首要，先生遂在《书法源流杂论》中先自对中古时期隶书、八分、楷书、正书称谓的含义与差异，给予了极为明白的梳理解释，原因就是此非大众甚至包括探讨书法的学人所能知详且常为之含混迷惑者，甚至有造成研究上的误读与谬失。故先生讲书法源流自觉应先要把字体这一问题揭示清楚，旨在发前人未发之覆以矫正视听，则其导出迷津、拨云见日的意义岂非尤见重要而实际。至于对“王羲之书师法钟张”的推理、对阮元“南北书派异同”的修正和对“晋唐小楷不可信”的结论，皆是先生淹通文献与碑刻书法的真知灼见。先生尝自我评价其《书法源流杂论》略云：“惟于役咸秦，多读碑志墨拓，于书法源流，颇思撰述……迁延十馀载，得杂论六首，为章寥寥……然依凭宝物不率信传世名迹，勾稽文献以推析后起谬说，词必已出，毋剿袭雷同……聊堪自慰者已。”并自认为所作“石刻墨本题记之稍有创获者”，惟“《葛祚碑额》考订有神论说书体递嬗，《龔龙颜》、《李思训》二刻之校勘则藉见前人撰述之不尽可信据也”。再

读先生旧作，愈加服膺其所能够自知与自得。

讲书体演变，先生亦最强调注意时代风尚与书法主流的递嬗，如从初唐褚薛的瘦硬到盛唐徐颜的腴美是有其渐变的脉络可循，即在颜真卿领袖壮美风骚之同时，已有如徐浩家族为典型的华腴书法肇开先声而值得留意。先生在跋唐天宝十载徐浩撰《徐俊墓志》拓本时指出：徐浩传其父徐峤之笔法而益工，《不空和尚碑》即其杰构，而《徐俊墓志》为浩子琇所书，《徐浩碑》又为浩子现所书，相较其笔迹体势悉同，则“说明这不仅是徐峤之、徐浩、徐琇、徐现几代有渊源的家学，当也呈现了其时由瘦硬转入腴美的书风”。推“知彼时书风已贵腴美而薄瘦硬，不特徐氏家学如斯耳”，亦非颜书一人之力遂能扭转时代风尚，的是慧眼卓识。若更比附近年新出的徐浩楷书开元二十四年《陈尚仙墓志》、天宝十三载《李岷妻独孤峻墓志》和永泰三年《李岷墓志》等以相佐证，则这一脉楷法风尚的演进特点自更加透明清晰。

先生于传统学术之主业以外，又兼擅篆刻技艺，凡所创作多能精彩通神而为时人称羨。先生治印走清代文人印一路，且最爱吴熙载之白文茂密而朱文挺拔，亦爱赵之谦之仪态万方、黄牧甫之浑穆拙朴和王福庵之工稳均匀。先生治白文仿汉印即最得黄牧甫之神韵，而治细朱文印则绝似王福庵之精工。先生虽以治印为业余爱好，然入道甚早，大约自弱冠入读中央大学时就开始随中文系老师郭则豫学习篆刻，如先生回忆：“到二十岁遇见郭则豫先生才真开始入门。郭先生字组南，号枫谷，所刻追踪黄牧甫，是一位真正的篆刻家，与时下某些以斯道自诩者不可同日而语，我在他熏陶下购置了黄牧甫、赵

拗叔以及王福庵等的正经印谱。”（《黄永年印存》前言）先生又尝在回复篆刻爱好者的信中强调：“如欲于篆刻入门深造，最好多看黄牧甫、王福庵、钱君匋诸人之印谱，在汉白元朱上打好基本功，且多刻姓名章。闲章并无用处，且字多不易掌握得好。”当然，先生之所以能高出时人而独树一帜，乃与其善写小篆分不开，故先生特别强调只有写好小篆方能治好印章。“文革”后期，先生治印最勤最多，一则彼时没有禁忌，二则冀望在艺术上有以寄托，故许多精品都是在此一时期创作的。

惟似先生这般于学术之外而兼精馀事如篆刻艺术且灿然可观者，并世无多，或誉之为“印林之隐者，不名而高”，信然。不久前，终南印社社长赵熊在《回顾的价值》一文中写道：“黄永年先生是终南印社创始人之一，他的篆刻在缺失了流派印这个重要阶段的当代长安，有着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一篇三十年前的《篆刻艺术》文字，是黄永年先生治学之外于治印的体会与总结。先生的某些观点以及对某些印风的批判自然可以看做是一家之言，但他主张的精纯典雅仍将以主流形态的一翼，振翻于当代印坛。”（引自2013年9月印行的《终南》第22辑）这应是对先生篆刻艺术最见中肯的评誉。

最后想就先生毕生坚守的治学态度说几句。先生尝自己选编了一本学术性随笔叫《树新义室笔谈》，在“自序”里先生这样解题道：“我这里只是借用了这个本属中性的‘树新义’，用来说拙文都有些新东西，或本为人家未曾讲到，或人家讲得不对，我来加以纠正。我认为这二者是写学术文章的起码要求。否则重复人家讲过的东西，把人家的东西冒充自己的创见，那就形同盗窃。早在《礼记》的《曲礼》里就有‘毋剿说，毋雷

同’的训诫，何况讲精神文明的今天。”不剿袭，不雷同，有心得，树新义，正映照出先生毅然与时下平庸、功利乃至巧取豪夺、欺世盗名的学术乱象不两立、不妥协的正大品质。读书治学，词必己出，坚守不易，传承更难，则我辈又该怎样努力肩负，方能趋近前路尚远的光明？可不慎哉。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思绪毕竟在这样的季节里最容易追忆。于是，坐拥清寂，染翰衔情，写下这篇聊以寄托的文字，希望能为永年恩师的七年之祭敬奠一瓣心香，希望能为《黄永年谈艺录》的出版奉上一份不能忘却的纪念，也希望能有一脉守望与传承可以绵长以无绝，久远而芬芳。

受业 王其祎谨志

2013年12月于西安碑林

目 录

第一章 书法源流杂论

- 一 隶书、八分、楷书、正书 3
- 二 王羲之书师法钟张 8
- 三 《兰亭序》为梁陈人书 13
- 四 南北书派异同 20
- 五 唐楷 25
- 六 晋唐小楷不可信 43
- 附：唐人楷书述论 48

第二章 篆刻艺术

- 一 篆刻是不是艺术 67
- 二 秦汉印章 68
- 三 明清以来篆刻 71
- 四 怎样写印章 74
- 五 怎样刻印章 78
- 六 印材印纽及其他 81

目 录

第三章 碑刻学

- 一 绪论87
- 二 分类95
- 三 拓本（附影印、装潢、藏印、题跋）113
- 四 史料123
- 五 书法130
- 附：石刻墨本题记142

出版后记153

第一章

书法源流杂论

讀書早跨沈敏求記付授選尊拂水裁
一隨六丁天上青鵲鶴花草也清涼
景雲箋注放盒字所於法付到海南
果是中必雙目贅點頭卷故井蛙誇
字編別有故明風一番整齊便不同
我愛唐栖支窟本烏共開畔印泥紅

題喬守承編本絳雲閣書目

一 隶书、八分、楷书、正书

《汉书·艺文志》谓秦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盖以别于其时之馆阁书小篆也。隶书行施日久，渐趋整齐，生波发，取代小篆，而为后汉魏晋时之馆阁书，观其时之丰碑巨碣无不作此体可知。隶书既成馆阁书，别生苟趋省易之书曰草书（初为草章，今草后起），所谓“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是也（梁庾肩吾《书品》语，见《法书要录》）。

隶书整齐波发成馆阁书后，遂有别赐以嘉名者。晋初卫恒为《四体书势》，四体者，古文、篆、隶、草也，其《隶势序》曰：“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曰：“〔梁〕鹄宜为大字，邯鄲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晋书》卷三六《卫恒传》）案隶书之整齐波发，乃积渐而成，非次仲所得独创，然魏晋时人以八分、楷法目整齐波发之隶书，观恒语则颇明晰。《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分，别也。”以其波发相背，谓之八分；以其规矩整齐，可资楷模法式，复谓之楷法。晋成公绥《隶书体》：“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分白赋黑，棋布星列。翘首举尾，直刺邪掣”，“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初学记》卷二一）。唐张怀瓘《书断》：“王愔云：次仲……作楷



《三体石经》。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刻，分别用大篆、小篆、隶书镌刻《尚书》和《春秋》的一部分，反映了古代字体演变的过程

征记》，谓：“国子堂前有列碑……表里书《春秋经》、《尚书》二部，大篆、隶、科斗三种字，……太学堂前碑……亦表里隶书《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四部。”（《御览》卷五八九）宋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北魏江式《论书表》（《魏书》本传）、酈道元《水经注》（“谷水”条）、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城南报德寺开阳门”条）所云异同，知晋南北朝人于整齐波发之书仍多目之为隶。（《后汉书》、《伽蓝记》

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是也（《法书要录》）。楷法亦曰楷书，其词盖起于南北朝时，南齐王僧虔录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韦诞“善楷书”，又谓诞“减子孙绝此楷法”（《要录》）。宋王愐《文字志古书三十六种目》（《要录》）、南齐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初学记》卷二一）皆有楷书而言八分，其意以楷书、八分为一物，有楷书不必重列八分已。惟隶书旧名初未因之而废，汉熹平石经，整齐波发体也，魏正始三字石经，其一字亦整齐波发体也（残石出土可证）。而东晋末戴侗撰《西